

从聂中丞华童公学到雷士德工学院——倪钜卿老人的求学经历

倪钜卿口述 施扣柱整理

我叫倪钜卿，1915年出生。现在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我有4个哥哥、3个姐姐，哥哥都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大哥倪本卿，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二哥倪源卿，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师、体育部主任；三哥倪清卿，圣约翰大学一年级时因肺病早逝；四哥倪诚卿，圣约翰大学医科毕业。3个姐姐都毕业于裨文女中¹。我的妻子周慧珍也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她有2个哥哥，都曾经在工部局华童公学²读书，4个姐姐也是清心女中³毕业。我把我的中小学和大学时期的经历回忆如下。

一 中小学时期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20年代（我1934年中学毕业）。小学是私人办的，办得很马虎。那个时候我家住在南市区，那个学堂就开在我家附近。大概叫常德小学。本来小学要读6年，我好像读了2年左右、3年不到。后来因为我家搬到虹口大连路，离聂中丞华童公学比较近。它也有小学部，办学质量也比较好，所以哥哥帮助我选择了这所学校。那时我爸爸已经死了，我二哥（他是圣约翰毕业的，现在已经故世了）跟校方联系好以后，就让我进去读书了。那个时候进小学考起来不是很严格的，只要家长去谈一谈，联系一下，学费一付就进去了。小孩用不着怎么样考试的。

聂中丞华童公学⁴是工部局办的。那个时候英国人工部局在上海英租界里一共办了4所华童公学。一所是老华童，最早的一所。接下来办一所育才，也是华童公学。还有一所格致。还有一所就是我们聂中丞华童公学。这个学堂学费倒不是很贵。四所华童公学至今保留下来的还有两所，一是育才，一是格致。后来再办一所工部局女中⁵，还有工部局小学¹，还办夜

¹ 裨文女中，前身为裨文女塾，后改裨文女校(The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of the Grils)，美国圣公会教士裨治文夫人爱丽莎·格兰特(Eliza Gillette)1850年创办。地址西门方斜路白云观附近。1941年始设南北两校，北校名福莘女塾，南校沿用原名。1951年易名沪南女子中学，1951年为市立第九女子中学。1969年起兼收男生，名市第九中学。

² 工部局华童公学，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理最早的一所华童公学，1904年由华商捐银3万两建于爱而近路、克能海路转角，1930年迁入赫司克而路汉璧礼西童公学旧址。

³ 清心女中，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夫人玛丽·范约翰(Mary Farnham)创办于1861年，并任校长。地址在大南门外陆家浜路。1928年获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批准立案。1953年改名市第八女中。1969年起兼收男生，名市第八中学。

⁴ 1914年恒丰纱厂经理聂其杰为纪念其父聂缉槩献地兴学，由工部局主办。聂缉槩曾官至中丞，故定名“聂中丞华童公学”。校址位于沪东荆州路。该校筹建时，聂其杰曾对工部局提出3点要求：1. 学校为非宗教性质，必须读中国圣贤之书，对基督教《圣经》只能略读。2. 进行商业职业教育，尤其注重簿记技术；3. 传授手工工艺技术如木工等。这些建议为工部局基本采纳。校长和主要教师均为外籍人士。首任校长端纳(L. H. Turner)。学制为英国贵族式，初级3年，高级6年，分设华文部与英文部。1928年华人教育处成立后，在陈鹤琴主持下，开始教育中国化改革。1932年9月，黄仲苏任该校华人副校长，审定华文各项科目。1933年起，该校华文部课程实行较大改革，充实商业课程，开始教授植物学、动物学；小学部的数学与图画，均用国语教授。1936年起，工部局建立华童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并鼓励学生参加上海市中学毕业会考。抗战爆发后，荆州路原校舍被毁，学校于秋季迁往康脑脱路（今康定路）1107号临时校舍，暂时实行半日制上课。1938年9月迁入外滩15号（前中央银行大厦）新址，恢复全日上课。1941年改为缉槩中学。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接管该校，改为公立。1951年改为上海市市东中学。

⁵ 即工部局女子中学，创办于1931年。1942年易名市立女子中学。抗战胜利后改名市立第一女子中学。1949

校。

聂中丞华童公学规定小学要读3年，我没有读完，大概读了2年不到一点就进它的初中部读初一了。不是因为老师说我已经可以读初中了，我就去读。是因为它小学（高小部）只有3年，我进校的时候，校方经过与家长的交谈，了解我已经读过一些小学的课程，就让我跳过他们学堂（高小部）的一年级，直接读二年级。

聂中丞华童公学小学部的课程就是用英语教的，老师不和你讲中文的，A、B、C、D起头，就和你叽里呱啦讲英语了。听惯了自己也会开口了。这样教，等于从小学开始就习惯听说英文了。但是中文也读的，古文也读的，四书五经，《论语》、《孟子》等等，我们都读的。抽出来读。有书的。

我原来就读的那个私立常德小学上课不是用英语教的，完全是中文。在那个小学堂里我没有接触过英语。那么进聂中丞华童公学怎么接得上它的英语教学呢？我的英语启蒙是家里教的。我爸爸懂英文的。他是律师，是外国律师帮办。有的中国人要请外国律师打官司，他就出场了。我爸爸名字叫倪紫垣。他死的时候，我只有8岁。后来听我妈妈讲，我爸爸当过清心中学校董，说明他在清心读过的。后来他到俄国去过，不知道是不是留学去的。反正他回来后带了这样大的俄文书4本。不知道他怎么学的俄文，怎么学的英文，也不知道他读的什么学堂。他从俄国带回来的书大概也是法律方面的书，我们看不懂的，他也不讲。因为小时候我在家里由爸爸教英文，他从A、B、C、D26个字母教起，所以我稍微懂一点点英文。这样到聂中丞华童公学读英文就不吃力了。一跳跳到高小二年级，总算也跟上的。

聂中丞华童公学也有中文教学，例如《古文辞类纂》，从高一开始读。还有唐宋八大家，也读。中国文字都是由中国老先生教的。有秀才，有戴铜顶子的贡生，还有举人。教中文的老师倒是古文水平不低的。就看学生自己注重不注重，读得好的人古文写的蛮好的，像我就比较推板²。我们不但读古文，文章也用古文写，那个时候社会上刚刚提倡白话文，我们学堂里还没有提倡。

我读书的时候，聂中丞华童公学里面外国老师大概占据1/3，中国先生也是讲英文的。中国先生教低班级，从高中开始凡是教英语课的，都是外国人老师。语文老师教古文，有老的头衔的，什么秀才、举人。英文老师是有学位的英国人教的，至少是学士。女的老师很少，有的时候有个把，来教个一年两年，就跑掉了，不长远的。我们毕业前夕，来过一个女老师，英国人。中学里男老师比较多一点。中国女老师没有。学生都是男的。学堂里上课时间，上午到下午总共6个钟头，45分钟一节课。吃饭好像回去吃。下午上课大概也要上到4点钟。关夜学没有的。要是犯了什么规的话，老师会叫你站到课堂外头去，站一课或者半课时间，这就是作为惩罚了。因为有的学生比较调皮，功课没有做好，或者是在教室里哇啦哇啦影响纪律。

放学回家后功课方面，中学里功课不算多，不象现在学生功课做到很晚很晚。我们中学里功课不大有的。回来稍微做做语文、英文作业，写写作文。还有做做算术、数学什么的，老师出几道题目让我们做。每天回家作业我一般做半个钟头，最多一个钟头，好像小学到中学白相³的辰光蛮多。白相什么呢？随便啥白相呀。在家的话，家里小孩多，可以一起玩。在学堂里呢，就在操场上踢球。踢小足球、大足球，都可以的。我们学堂操场很大的，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下课了就去白相，蛮开心的。有的同学家里有脚踏车，就踏踏脚踏车玩，那个时候脚踏车还蛮希奇的。但不能在学堂操场上踏脚踏车，校方怕碰伤人，所以学堂里老师看见要管的。那时白相球类还有打墙头，就是打手球，小皮球打墙头。这个游戏我们同学

年起称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1960年起定为市重点中学。1967年开始招收男生，为上海市第一中学。

¹ 工部局华童小学共有9所。

² 推板，上海话“差劲”的意思。

³ 白相，上海话“玩”的意思。

一起白相。跳绳子那个时候好像不大有，因为人大了，不大跳了。小的时候会跳跳绳玩。学堂里还比赛排球，是班级比赛，但是有老师参加，做公证人。班级与班级比排球、比足球都有。这都是大球。校际比赛也有的。工部局四个中学，联合比赛。在什么地方比呢？我们学堂足球场，或者是他们学堂的运动场都可以。工部局学堂都有运动场的。比赛时间一般在星期六、星期日，不放在上课时间。也不是规定每个人都要去，你高兴去就去。参加比赛的人去，其他同学愿意去看的自己去，不硬性要求。这是指学堂与学堂比赛。班级与班级比赛因为一般在自己学堂里举行，观看比赛的同学就比较多一些，不去观看的人也有，不喜欢就不去了。但是参加踢球的、参加拍球的人，那是一定去的。他们平常也无所谓训练，下课的时候高兴了就拿只球，两三个人去拍拍打打。学堂里没有篮球场，所以我们篮球不大拍打的。英国人欢喜足球，排球也拍打的。我比较欢喜排球。班级里比排球，我参加的。因为排球比赛中间有网拦起来，不用和对方队员争抢碰撞；而踢足球运动量比较大，我跑不动，所以我不大参加。我们学堂里有几个同学足球倒是踢得蛮好，后来到东华足球队去了，例如罗光斗踢左锋，读书不读了，专门踢球了。那个时候东华足球队很有名的。李惠堂啦什么。但是东华足球队比赛我们不去看的。一是没有时间，二是票价比较贵，家里不大同意的。

我们同学之间放学以后到人家家里去串门的不多，打乒乓有的。学堂里可以打乒乓，打得好的人也蛮多。我同班有几个同学就打得蛮好。我打不好。这不是上体育课，就是平常同学自己玩玩，学堂里不组织的，学堂里组织的是排球、足球比赛。没什么体育课。游泳也不组织的。要游泳的话，暑假里可以自己去。我没去过。

校长训话，一般在大厅里。那个大厅里不吃饭，就是开会用的。里面没有凳子，台子也没有，只有一只讲台。校长训话的时候，一个一个班级都排好队伍站着，没有坐的，校长在讲台上也是站着。那个时候校长是外国人，还有一个先生给他翻译成中文。一般大概半个钟头左右，大家都站着，校长也站着。站着蛮吃力的，所以讲话就简短。训话间隔时间并没有规定，要看有没有事情。有的时候有事了，就一个礼拜一趟，没有事了就不讲。我记忆中校长不大训话的。

总的来讲，学堂里蛮自由，老师不怎么管得紧。但同样的时候有别的几所外国学堂，英国人的学堂，有老师责罚学生，打屁股也有的。后来大概取消了。我们这里没有体罚的，没有看见过。最多叫他站出来立壁角，或者站在课堂外头。这样处罚已经蛮严肃了。

聂中丞华童公学学生数量并不太多。新学年开始也不过招约 20 人，读到后来人还会越来越少，有的学生读读不行啦。我们中学到毕业的时候，班级里学生只有 6、7 个人。还有的学生读到初三、高一等等，英文会说一点了，家里家境比较差一些的，那么就不读了，去就业了。那种外国人的洋行里，你会洋泾浜英语就可以了。也有的学生不毕业就去考大学了。这个学堂出来的学生水平，考大学是可以的。总之，聂中丞华童公学的学生当中，真正毕业的人很少。所以班级越是临到毕业，人越是减少，中学阶段学堂也没有其他人插班进来。可以说是只有出的，没有进的。

毕业考试方面是这样的：它照英国的办学规律，中学毕业考试就等于大学的入学考试，两者是相等的。进大学不需要再考一趟了。但是他们中学毕业考试的题目是大学里来的，所以它的程度就是大学入学考试的程度。通过了这个考试以后，你可以选择去读大学，也可以选择不去读大学。但是，考试合格，意味着你已经具备了入大学的资格。至于读不读大学，那是你的自由，和学校无关。像我们上海的几所所谓华童公学呢，考的是香港大学来的题目。这就算中学毕业考试，同时也是大学入学考试。考试通过以后，对于大学的选择是比较多的，如果不想进香港大学学习的话，英国的大学也可以选择，伦敦大学也可以，剑桥大学也可以，牛津大学也可以。总之，中学毕业考试合格就意味着你中学毕业了，可以跨进大学了。实际上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没有在聂中丞华童公学读到毕业，所以没有参加它的毕业考试。但听老的学生讲，其实这个考试的题目不算最难。它主要着重的还是英文，数理化方面的题目，

一般讲起来是浅得很，不是很高。

我觉得，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学堂有个特点，中学里的水平并不怎么高，一般还是着重英语，要开口讲。和中国人办的几个好的学堂像南洋中学¹等比较，数理方面水平比他们低，读的书也比他们浅。不过英语比他们好。一般读到高中一、二年级，就要开口讲英语，和外国人谈谈。我在聂中丞华童公学读到高二就不读了，为啥？上面已经讲到，华童公学毕业以后，提供学生选择的大学是香港的大学或者英国的大学。我不想到香港去读大学，也不想出国留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留学那么热，我们觉得不一定要出国去，在上海几所大学读读也蛮可以了。我最想考的大学是交通大学，考它的机械系。我知道交大机械系的数理化要求很高，而南洋中学数理方面比较好，有利于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所以读到高二我就从聂中丞华童公学转出来，去读南洋中学了。这个学堂在日晖港，是王培菽²他们办的。校长王培菽在上海很有名气。我到南洋中学去读高中三年级。高三毕业时，我还不知道这个雷士德工学院³已经开办了。所以直接报考交大机械系，但是没有考取。它的数理化程度要求很高，实在太难考。相对来讲，交大化学系的数理化要求要低一些，管理系这个要求更低。但我就是喜欢机械系。后来我又去考大同大学⁴，被录取了。正在这时候，我从报纸上看见雷士德工学院招生的消息，就和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去考。那个时候考学堂好像不要钞票的。你去报名，登记好了，到时候你去考试就行了。钞票可能是学堂里付掉的，因为要老师改卷子。这几个大学考试好像都不要钞票的，我不大记得清楚了。考试考半天不够的，大概是要考一天。我觉得雷士德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倒不难。不是因为我们中学里学得好，主要是这个考试着重英语，要求能够听得懂英国话。听不懂英国话你当然就考不进。我们因为中学里有这个英语基础，所以容易考进。但是考进去以后发现在里面读书学习要跟得上是很不容易的。被雷士德录取后，我就放弃大同，到雷士德去了。

二 雷士德工学院

1934年开始我进入雷士德工学院学习，进去就直接读大学的。雷士德当时也开办高中，将上海一个英国人办的中学——麦伦书院⁵并进来，办理高中。一开办高中，大概也就想到办初中，一道办了。我在雷士德机械系读了三年，1937年因病休学，1938年学堂因打仗暂

¹ 南洋中学，近代上海著名中等学校之一。前身为育才书塾，1896年王柳生创办于上海大东门，1900年起由王培菽校长。1904年改名私立南洋中学。1956年改为公立学校。1959年起定为市重点中学。

² 王培菽（1871—1952年），名植善，以字行。上海人。近代著名中小学教育家。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院。1900年接办育才书塾（后改名育才学堂、南洋中学），校长53年。

³ 雷士德工学院，遵循英国人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遗愿、并由其独资开办与维持的著名高等学校。1934年10月1日正式创建。首任校长英国伦敦大学工学士、英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Bertram Lillie。校训“苦心志，劳筋骨”。校址位于东熙华德路（今为东长治路海员医院），总面积8000平方米。学制初为3年，1938年改为4年。入学考试门类为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力学。已通过英国各大学入学考试或上海圣芳济等校毕业生，可免试入学。学生毕业后还可在沪参加由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派员监考伦敦大学学位考试，是除香港大学外，在远东获得伦敦大学学位认可的唯一学院。抗战爆发后，学校因所在虹口地区被日军侵占而被迫暂时关闭。复校后，校务日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派出同文书院院长池田接管学校，将校内英籍人士均关进集中营。1944年校舍被日军占用，学校被迫宣告停办。抗战胜利后，校舍被国民政府海军接收。从日军集中营获释的学校英籍人士曾试图复校，终因校产和雷士德遗产损失惨重未果。该学院办学10年间，共培养学生1000余人。

⁴ 大同大学，近代上海著名高等学校之一。1922年由立达学社创立，1922年改称大同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被合并。

⁵ 麦伦书院，前身为1891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所办华英书馆，初址山东路麦家圈。首任校长伦敦会牧师包克私。分设正馆、备馆，学制凡8年。1922年改设高、初中各3年，增设预科。1927年夏晋麟为首任华人校长。翌年改名私立麦伦两级中学。1941年底改名迈伦中学。1953年改为继光中学。

停。我于 1939 年复学、直至毕业。

雷士德工学院上课的大多数是外国老师。有个别中国人，我在校的时候，好像有两个中国老师，一个是留学澳大利亚回来的叶老师，教建筑。另一个是留学美国回来的，教的课程不太清楚。其余都是英国人。课程设置上，雷士德和中国的大学不同。中国的大学课程，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据我了解，象高等数学，是在大学一年级读，后面几个年级不再读了。雷士德学堂的高数是从头一年读到最后一年，从大学一年级读到大学毕业为止。它的课程是配套的。例如机械课上涉及到某一个数学难题，下一节数学课必定会把这个数学难题讲清楚，学生学了就能用，记得很牢。总的来说，它的数理化课程水平并不比中国大学的低，但是蛮严格的。雷士德学堂最独特的教学特点就在于它上课是没有书、没有教材的，全靠老师讲。老师来上课不带课本，有的拿张纸头就来上课了，有的一张纸头也不拿的，就拿一支粉笔。上课时，一面老师在讲，一面我们学生就记笔记，记下来的笔记就是我们的学习材料。不像其他大学，多少有些教材、教科书。这些东西雷士德工学院一点没有的。

他为啥不拿书过来呢？说明老师已经把课文内容吃透了，消化过了，上课时再回出来。等于以前中国人喂小孩一样，食物在大人嘴巴里嚼过以后，再给小孩吃。这种方法讲起来有一点不卫生，实际上有助于小孩消化。雷士德老师上课也是这样。就是促使学生能够消化，能够吃得下去。雷士德的特点就在这个地方。老师的水平就在这里看出来。有的老师跑进教室，手里一张纸头上只画了一幅图，他在黑板上先把这幅图画好，然后就开始讲下去了，就凭肚皮里知识这样讲下去，黑板上什么也不写的。我们就这样听他讲课，把它记下来，记下来就是我们的课文。来不及记怎么办？来不及记嘛你也要尽量想办法快呀，不能漏掉，漏掉你自己吃亏，补不到的。所以我们的英文程度也是这样提高的，实际上是用这样的方法逼着你提高。总之，雷士德没有一本课文，读到毕业也没有一本课文。这个学堂老师的水平就这样吃硬。

当然上课的时候，老师不光自己讲，他也要提问学生。比如教高等数学的老师，他拿着一本书进教室，上面都是题目。他在黑板上把题目一道道写下来，就开始做解题，做一步，回头问一步，“下一步怎样”？有的学生行的，就回答说怎样怎样做。说得对的，他就照样写下来；讲得不对，老师就自己写。这个就是启发学生，集中注意力。理论他也讲出来了，为啥道理这道题目他要这样做。在题目做好后，把理论提出来，列出来。有的学生可能会做题目，但是不晓得啥道理，老师再帮助拎一拎，知识就掌握得更加牢固了。

我们学堂的老师是根据英国的制度，分为高级老师、低级老师。高级老师不容易的，我们学堂里高级老师没有几个。对请来的老师，学堂方面会介绍的，例如在学堂的说明书上写出来，姓名、毕业学堂、学位等等。英国请来的高级老师、教授是通过专门考试的，有资格的。这些老师上课讲得清爽得不得了。记得有一个高数老师，是我们读到毕业班的时候请来的，就听他上这样一年的课，我们学生感觉大开茅塞，得益非浅。这位老师没有话讲的。本来不懂的东西，让他一讲，清清爽爽。本来教我们数学的一个老师，也是英国人，而且是皇家学院毕业的，但他是化学系出身，化学系老师教数学总归有些隔膜的，不是他本身的专长。教研组觉得他上数学课，我们学生不大吸收，就把这个高级数学老师请来，原来的数学老师还搞他的化学去。

对于老师上课的情况，学堂教研组要来了解的。有时候校长也来听课。教务长的课他也来听。我们这个教务长名叫 Sanger，除教务长之职外，还兼任机械系主任，每天都有课。有一次，教务长来给我们上力学课，校长到我们教室里来听课，坐在后头。我们觉得蛮紧张，校长严格得不得了，老师看见他也怕的。校长听课事先从来不和我们讲的，往往上课半当中他就来了，进来以后往教室后排座位一坐。那是校长要直接了解教学情况，到底老师上课上得怎样，学生学得怎样。听完课以后，校长还要和被听课的老师交流意见。我们校长英文名字叫 Bertram Lillie，中文名字叫李贲思，他本身是一个学习尖子，读大学的时候自己没有出

过钞票，都是依靠奖学金。因为他自己学习好，业务精，所以听课能发现问题，老师也服帖。

上面说的这个教务处长现在已经去世了，享年 90 多岁。抗战期间我们学堂关掉时，他在日本人的集中营待过。学堂里好几个外国老师也都在日本人的集中营待过。有的同学去集中营看望过老师。我没去。从集中营出来以后，教务处长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还曾经到工厂里来看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工作。虽然我们已经毕业、离开学堂好几年了，他还叫得出我们的名字，一个都没有搞错。他对学生感情是很好的。他觉得在上海、在雷士德很开心，而且他是教务长，在学堂里很有权力。他实在欢喜这所学堂，不愿意离开。对于这个学堂他很有感情的。但是后来雷士德复校没有成功，不久他就回国去了，因为英国大学里老师客满，他跑不进，就到加拿大一所大学里去教书，教到退休。

雷士德教的东西比较广泛，我们教务长常常强调的一点就是，“你们要用常识来对待东西”。他们英文讲起来，叫 *comensence*，“你们随便什么事体都要用 *comensence* 来衡量，用常识判断，然后自己把理论、实践追加进去分析，这个事情就好做”。所以他说在工作当中，*comensence* 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学堂的确在这方面蛮强调的。老师就是教给你们一个基础，然后你们自己还好去发挥。要发展，要广泛发展。但首先要判断，用常识来决定。

我认为，英国的教育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雷士德出来的学生大多数都会动手，动手能力比较强，到现在还会动手。学堂很重视实习，专门购买了很多设备。学堂建筑造成飞机型的，一面机翼形的建筑放置木工、木工机械，另一面放金工机械，后来添造了热工机械，放得满满的。我们的设备，据他们外国人讲，比伦敦大学机械系的设备还要新式。你看我们的校长，多了不起，他把那个时候英国最先进的东西拿来作为我们的教学设备。外国大学历史比较长，设备也都比较老，教学用用无所谓的，所以也不去换啦。我们学堂是新办的，所以都是最新的设备。而且我们这些教学和实习设备是全套的，不是零零碎碎的，也不是光应付当时的系科，也许还考虑到了学堂今后的发展需要，这些设备大有潜力。例如水利方面的闸门等等小型设备，我们学堂实验室也有，一些水利实验也可以做。水利也跟机械有关系。假使以后设立水利系，这个设备也有的，能用的。所以这个设备有潜力。因为学堂设备比较整齐配套，许多实验实习就在学堂里进行，不要到外头去做。当然大型一点的设备，像发电设备等，就依靠电力公司帮忙，学堂经常组织到上海的杨树浦电力公司去参观。可惜学堂里这么好的设备后来长期不用，都坏掉了。日本人在的时候，也是乱弄的。

为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学堂安排了一些实习课程，它的时间和课堂教学时间不是对半的，一礼拜最多两次。上实习课的时候，学生需要去动手，有老师在旁边指导。指导老师都是英国老师，就连下手也是英国人。例如热工机械实习助手是船上做过的“老鬼”，英国人，管热工间的，有事情老师一喊他就来。因为他熟悉设备，是学堂专门请来的，一直住在学堂里。实习不是做过就完了，实习结束后要写报告。譬如讲，做一项实验，实习过了，要写下来，你是怎么做的，结论是怎样的，都要详细写下来。写下来的报告要交上去，让老师审查。实习报告不及格的话，也要留级的。所以说，雷士德这个学堂的确可以培养一些人，培养出来的人没有浪费的。他的学生出来，都是蛮扎扎实实的。有许多高楼大厦，都是我们同学设计的。停办这个学堂，的确可惜。

读书、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是远视眼。学堂里同学近视眼也不多。现在讲教育要抓得早，我们读书的时候抓得晚。现在从小学里就抓起来了。抓得那么早、那么紧，眼睛势必至于反而不好。我们那个时候，小学里白相时间很多，中学也是这样，放学回来根本没有什么很多功课，我小的时候好像从来也没有像现在小孩这样忙。大学里倒是功课比较多，时间显得比较紧。大学里的功课实在重要啊。尤其像我们大学，没有现成教材，要是缺掉一课就苦头吃足，一定要去想办法补转来。我就吃过这样的苦头。那是在我临毕业的最后一学期，我因为小肠炎开刀，缺课一个月。本来听我哥哥讲，要开刀的话，放在寒假里开，最多两个礼拜左右就差不多了。结果开刀后，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恢复，害得我脱课一个月。雷士德

没有现成教材，缺掉一课就苦得不得了，我缺掉一个月的课，怎么跟得上呢。我到这个同学那儿去抄点笔记，那个同学那儿去抄点笔记，幸亏他们都让我抄。但是光抄下来我还不懂，还要理解。因为老师上课是一面写，一面讲的。学生记笔记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消化，不可能把老师讲的全部都记下来。我发现光靠补抄笔记还是跟不上，又不舍得放弃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因为雷士德学院毕业水平相当于伦敦大学的学士学位。所以我讲这个文凭还是要的，病休完复学之后，我一定要再去学堂学习，把本事学到手，把文凭拿到手。我决定干脆休学一年，第二年再继续上学。谁知道第二年碰上日本人进攻上海，学堂停课。哎呀，本来我在头一班呀¹，这样一来，我直到1939年才毕业，晚了两年。

雷士德基金会²的母体在英国。雷士德死了，有几亿英镑，他钞票多数是从中国来的，他搞建筑设计，做地产生意，钞票赚了很多，一生没有结婚，他讲我从中国赚的钞票要用在中国。所以他组织了一个基金委员会，这个基金会在英国有人管的，分一部分产业到中国来，做几桩事体：第一桩，仁济医院；第二桩，我们这个学堂；第三桩就是一个研究所，在北京西路。三个东西，是他的基金，钞票只用了他的一部分。雷士德自己是宗教信徒，但是他却坚决反对把宗教带到教育中去，明确规定雷士德不设宗教课程。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

三 职业经历略述

雷士德的学习经历对我以后的职业发展带来很大帮助。我毕业以后，有同学介绍我先后在中国老板的几个私人厂去工作，外国老板的工厂我没有做过。那时候找工作，人家听到雷士德毕业的，肯定要的。学堂里一出来，我搞过螺丝攻（即螺丝刀），大大小小的螺丝攻。这个螺丝攻是钢做的，要搞热处理，做钢铸工具。后来到新兴链条厂³，老板是我的同学。我开始搞自行车链条和自行车装配，牌子叫Omega，这个牌子当时在上海也蛮有点名气的，它的刹车象汽车的刹车，我们叫它花鼓筒刹车。后来厂里搞轧铜板，把厚的铜皮轧薄。我负责搞热处理，做成钢制棍子，自己轧铜皮。

解放前夕，有同学约我一起去德国，因为老母亲还在，我舍不得离开，“父母在，不远游”嘛，何况我父亲去世早，母亲把我们8个子女养大成人、而且都接受良好教育，不容易啊。所以我没有去德国。不久我得了肺结核，大概休养了一年。身体好了以后，我去找同学帮忙找工作，正巧一个同学要到开封去安装发电厂机器，他是安装公司的老板。我就和他一道到开封去。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那套发电机被国民党炸过了，机器七零八落翻在地里，集中装起来是好用的。但我们那个同学不敢动手，他理论是懂的，就是怕，不敢动。雷士德同学里也有个别不敢动手的啦，没有办法。但是大部分同学动手能力是比较强的。我就比较敢动手，也欢喜动手摸。不是手巧，还要胆子，还要懂，懂得这个道理，乱弄要闯祸的。所以敢动手实践，真是很重要的。实践可以让你更加明确书本上的道理。大概8个月或10个月左右，把开封的机器安装完以后，我又到郑州去了一趟，那里也有一个小的发电机厂，工作一阵子后，我回到了上海。

这时，我表兄给我介绍了原来派克公司的老板纽永春，他要制造金笔、自来水笔。把我请去后，就开了自来水笔厂，金笔厂⁴。我给他们搞出了永生金笔，就是后来新华笔厂的永生金笔。这个笔牌子比较好，能够出口。现在是大量用于出口，国内基本不大卖，价钱大啦。

¹ 倪老先生1934年考入雷士德工学院，如果不是因病休学，他应该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² 亨利·雷士德基金会是以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年）的名字命名的。1926年在上海去世时，他留下遗嘱，明确规定将他名下的全部产业委托工部局管理，并由他指定的亲朋好友监管，必须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工部局为此专门建立了“雷士德基金会”，随即对雷士德遗产逐一登记和统计，当年估价总资产为1434万两，由于雷士德遗产大多为房地产，仅土地就有600余亩，到了第二年重新估价时，总值就达到了2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全部注册资本。可见雷士德基金会实力之雄厚。（参见薛理勇《亨利·雷士德其人其事》，载《新民晚报》2005年1月30日）

³ 公私合营后改为上海自行车厂。

⁴ 公私合营后成为新华笔厂。

公司合营后，我调到制笔公司，在公司工程师室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四川路新亚饭店楼上。后来要支援国外，那个时候苏联也要搞金笔厂，需要我们帮助搜集资料。有人负责搜集资料，写了一厚叠专业的东西，叫我翻译成英文。汇总的东西，都由我来整理。然后把写好、翻译好的资料寄给苏联和其他若干国家。后来他们大概看看手工的比重太大，不太感兴趣。

那个时候我们做金笔的手工比重的确是比较大的，因为机械设备没有那么好，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改进很多了，原来做的方法手工比重还要大。例如笔杆，原来是靠车床车棒料，一根根笔杆那样车下来，速度很慢。后来我到上图查找外文资料，试验了好多次，终于搞成功一个革新，就是把塑料粉先放在一只盆子里加热，从料口里转出去，经过制塑机模子，一枝枝笔杆就已经成型了。这个东西成功之后，产量大增。

这个革新做了之后，要搞援外工作，支援其他国家。我去搞制笔机械设计。和同济大学的一个机械工程师，还有中法工学院¹毕业的一个机械工程师，一道搞援外设计。之后我们局里要办大学，办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叫我去教书，教金属工艺学。不久，局里又把我调回去了，又要搞援外设计了。这次援啥人家呢？阿尔巴尼亚。我又要搞翻译、搞资料，搞好寄去。后来阿尔巴尼亚没有胃口了，不搞了，又把我调到上海塑料模具厂，在制塑机上制模型的模具厂。70年代末被评为教授级工程师。在模具厂我一直工作到退休。

国外去过两趟。第一趟是1979年到荷兰，那个时候我在塑料公司塑料二厂。轻工业部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去荷兰考察管子行业。因为荷兰是一个水利国家，专门搞水利，他们的管子行业非常发达。我们去访问考察的时候，他们国家的管子已经改造过了，我们用的管子都是金属管子，不是铜的就是铁的。这样管子容易生锈，容易金属腐蚀。荷兰那个时候已经全部用塑料代替了。很大口径的管子，也是塑料做的，埋在地底下。这次考察的任务，就是想要进口做这种管子的机器，生产大的塑料管子。部里派人到上海来物色一个人，要求能用英语翻译，又要懂生产业务。结果找到我，就让我去了。由轻工业部一个处长带队，一共5个人。荷兰去了大概一个月不到一点，考察了他们的管子行业，其中有的塑料厂非常大，有5000多人在工作。我们仔细观看他们塑料管子怎么生产出来的，用什么机器生产的。那个时候，照我看，应该买下来。不买，自己没有办法做。但处长没有胆子拍板，结果回到部里一汇报，部里还是要进，结果后来又去荷兰，仍然进口。进口的机器中有一台在上塑二厂。

这件事后我仍在厂里。后来我们二轻局局长胡铁生要想搞一个模具研究所，开头着眼我来组织。后来不晓得怎么搞到交大去了，听说与交大力学系的教授谈拢了，要搞这个模具研究所，让我也参加，到交大去办公。后来没多久要到美国去考察。交大组织了两个教授，再有机床所一个、再加我厂里一个，大概4、5个人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考察。一个月不到，跑了6个州，看了好几个厂，了解了一些情况。回来后，这个研究所组织成功，在交大力学系继续下去。我后来退出了。

¹ 1907年初名德国国立大学，1923年改名中法工业专门学校。1929年名中法国立工业专科学校，1931年定名中法国立工商学院。